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论文

关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 的初步探讨

军事学院 姚延进

一九八三年十月 北京

关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探讨

军事学院 姚延进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

“自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我们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学习胡耀邦同志这一论述的时候，不少同志认为，军队应该了解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军事思想有哪些发展，并且要了解实现这些发展的原因，以便肯定成绩，吸取经验，更自觉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

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了和大家一起共同研究这个问题，现把自己在学习《邓小平文选》和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文件以及首长文章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的点滴体会发表出来，作为抛砖引玉。我体

会，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得到了全面地坚持和发展的，现仅将自己体会较突出的部分内容试述如下：

一、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的总目标及一系列指导原则，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军思想

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只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军队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在阐明全面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的基础上，也明确提出了开创我军建设新局面的总目标。这就是：“要努力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把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进一步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要继续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加强和改进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我军的每个成员都能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的作风，使我们的军队不仅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而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这一总目标，把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密切地联系了起来，把保卫祖国与建设祖国、平时准备与战时作战辩证地统一了起来，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军一切行动的纲领和指针。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本来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统一体，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尽管没有把“三化”集中起来讲，但作为三化的每一个思想，他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提出过。后来，由于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尤其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在所谓“突出政治”、“政治可

以冲击一切”的错误口号泛滥下，既歪曲和破坏了我军革命化，又取消了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从而使我军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党中央、中央军委通过拨乱反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肯定和贯彻这一目标，不论从建设四化的要求看，还是保卫四化的要求看，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是对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科学继承、坚持和发展的一个集中表现。

在这一总目标下，提出了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就是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认为这是开创我军建设新局面的中心问题和紧迫任务。胡耀邦同志指出：“培养和选拔大批能执行党的路线，有干劲，有能力的年富力强的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是全党紧迫的任务，对军队来说更为紧迫。因为军队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关于干部的革命化，过去虽强调过，但被歪曲和污染了；关于年轻化，毛泽东同志也很重视，但并没有落实，反而干部的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至于知识化、专业化，虽然有时也提过，比如曾一度提过“又红又专”的口号，但总的说来，强调的是不够的，这一方面受我军过去的状况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后来“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狂妄程度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他们把历史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科学文化成果统统作为“封、资、修”加以批判，把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加以摧残，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别有用心地制造知识分子干部同工农干部的矛盾，把两者之间划了一条很深的横沟。这种流毒在党内、军内是很深的。为了拨乱反正，党中央毅然宣布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是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之一，离开了知识分子，离开了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因此，强调把干部的学历、学习成绩作为使用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明确今后从战士中选拔干部必须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并经过院校培训，考试合格才能进入干部队伍；强调团以上各级军官，必须经过院校比较系统的培训才能提拔；重视选拔使用“文化大革命”前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等等。这一方针不仅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干部问题的正确思想，而且对林彪、“四人帮”在干部问题上的谬论和罪行进行了有力的拨乱反正。

在这一总目标下，深刻阐明和认真贯彻了“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实现了训练指导上的重大转变。训练有素是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恩格斯指出：“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毛泽东也指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这些指示是十分正确的。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打着所谓“政治建军”的幌子，胡说“军事训练差一点不是那么严重”，“训练越多，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远。”别有用心地批判“大比武”，大砍军队院校，解散教员队伍，取消军事训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部队普遍存在着“抓军事训练危险”的思想，使部队军政素质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不下决心狠抓教育训练，军队的军政素质就不可能提高，战斗力就不可能增强。因此，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担任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后，就在逆境下，以革命大无畏精神提出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的英明主张。但由于错误的“批邓”斗争，使这一思想没有得以认真贯彻。粉碎“四人帮”

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军委其他负责同志，又结合新情况反复重申了这一重要思想，并在实践中进行贯彻。

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包括了军事、政治、后勤等各方面的教育训练。强调把训练的重点放在战争初期的作战上；强调紧密结合作战对象、作战任务，因地因任务制宜地进行训练；强调加强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训练；强调研究外军和重视文化科学知识学习；强调突出对干部的教育训练。军委还特别重视加强院校建设，强调院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使院校成为训练、选拔、推荐干部的集体干部部。要求全军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办好院校对加强部队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把关心和支持院校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求拿最强的干部办院校，送优秀干部、战士进院校学习，把先进技术装备优先发给院校。这些重要思想是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建军思想发展的一个十分突出的内容。杨得志同志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论述的体会文章中深刻指出：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时代的要求，是关系整军备战全局的一个战略决策，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军部队、院校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各级党委把教育训练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来抓，在训练指导上实现了重大转变，即由抓兵的训练为主转到了以抓干部训练为主；由抓单一兵种训练为主转到了以抓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训练为主；由抓打步兵训练为主转到了以打坦克训练为主。这“三个转变”，标志着我军的训练水平在适应现代战争方面，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这一总目标下，强调改善武器装备，提高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军队现代化程度的重要

标志。要实现我军的现代化，就必须大力改进和发展武器装备。列宁说过：“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也曾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把毛泽东关于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的话加以篡改，似乎人民战争同武器装备势不两立，把强调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重要作用的正确观点当成所谓“唯武器论”而加以批判，造成讲人保险、讲武器装备危险的极不正常局面。三中全会以来，把改善武器装备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点而加以强调和贯彻，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还说，要“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明确我国发展武器装备，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有选择地、有限度地引进一部分国外的先进军事技术装备。我们发展武器装备和超级大国不同。超级大国为了称霸全球，特别强调发展进攻性的尖端武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侵略别人，我们要从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的安全出发，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武器装备。从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来说，以发展常规武器为主，同时发展一些核武器和其他尖端武器；在常规武器中，以反坦克、防空武器为重点；从发展现有武器和新式武器来说，我们首先要立足现有基础，加强与改造现有武器装备，提高其战斗性能，同时努力研制和生产一些新式武器装备。关于发展武器装备的这些指导思想和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它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性

质、国民经济状况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要求。可以坚信，只要认真贯彻这些思想原则，我军的武器装备就能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得到改善。只要我们既重视改进武器装备，又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就一定能永远立于主动不败之地。

在这一总目标下，提出和贯彻了改革军队编制体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力求使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人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就针对林彪、“四人帮”把军队搞得臃肿的状况，提出了军队要整顿，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要处理等重要指导思想。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不仅进一步强调了这些思想，而且付诸实施，通过改革军队编制体制，有效地贯彻了这些思想。改革编制体制是一场革命，要实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必须建立合理的编制体制。杨尚昆同志强调，改革编制体制必须认真贯彻精兵的原则，合成的原则，平战结合的原则和提高效率的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适当地压缩军队定额，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装备，有些部队平时实行简编编制，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和院校、科研机构；缩小指挥机构平时编制与战时编制的差别，切实明确职责分工，以便在爆发战争时能立即执行任务；从编制体制上把诸兵种捏扰起来，力求做到使常备军及其机关精干化，武器装备、尤其是反坦克和防空火器有所加强，机动能力有所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有所加强。小打，现有部队就可以打；中打，稍加充实也能对付；大打时，能保证部队迅速扩编。这些思想原则的提出和贯彻，有效地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实行“统一的编制”的指导思想。

在这一总目标下，恢复和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毛

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向十分强调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但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严重破坏了这些优良传统。他们别有用心地过分夸大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使政治工作同其他工作的关系变成领导与被领导、统率与被统率、冲击与被冲击的荒谬关系，造成很坏的影响。三中全会以来，特别近一两年以来，强调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既非常重视加强政治工作，又实事求是地给政治工作以适当地位，从而不仅没有降低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是真正提高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最近部队普遍开展的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活动、双先活动，以及深入开展的“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重要表现。这些活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将对我军建设产生深远的革命影响。

二、加强了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研究和准备，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

我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还是如此，舍此无其他更有效的办法。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未来反侵略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人民战争的威力将会怎样？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重要现实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同志发出“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号召，并深刻指出：“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叶剑英同志也深刻指出：对付霸权主义最根本的是实行人民战争。这些指示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探讨现代条件下人

民战争的热情，而且极大地坚定了人们的必胜信念。现在人们对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的认识越来越深化，认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不仅大不同于历史上一般人民战争，也不同于我党领导的历次人民战争，也有别于一般现代战争。它是抵抗霸权主义侵略的持久战争；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参加的、各条战线相配合的全面战争；是三种武装力量相结合、诸军兵种协同进行的现代化立体战争；战争的破坏大，消耗多，对国家经济和后方的依赖大；战争的领导和指挥更加复杂困难。这些特点，不仅决定了未来反侵略战争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斗争更激烈，也决定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更巨大，最终必将打败侵略者、夺取最后胜利。三中全会以来，人们对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认识的提高和必胜信心的进一步坚定，不仅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动力。

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从根本上阐明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一向非常重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问题，作过大量重要指示。但由于十年动乱，战备工作很不落实。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普遍关心从根本上加强战争准备、强化人民战争威力的问题。胡耀邦同志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广大指战员的心愿，深刻阐明了对付霸权主义侵略的三项最大准备的指导思想。第一大准备，就是要同心同德，军民一致，下决心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国民经济不搞上去，要对付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困难不知道有多大，人心也不行，运输也不行，武器的现代化也有困难。第二大准备，是以极大的努力加强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如果这个团结问

题不生根，军民不是一条心，打起仗来，那个困难不晓得有多大。相反地，我们团结是一致的，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是一致的，我们的办法多的是，我们的力量强的是，潜力大得很。赵紫阳同志对此也作了深刻地强调，指出：新的长城，真正的长城，全完打不破的长城，是军政军民的密切团结。第三大准备，就是要把我们军队本身建设好，从战略思想一直到军事、政治的各种建设都要搞好。这些指导思想是十分英明正确的，它不仅符合战争同经济、同政治、同军事等因素的辩证关系，符合现代条件下实行人民战争的客观要求，也符合我们过去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科学典范。只要认真贯彻落实这些指导思想，就能为实行全面持久的人民战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就能从根本上创造举国一致、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奋战到底的政治前提，就能卓有成效地提高人民解放军的军政素质和现代条件下的快速反应能力、自卫能力、合同作战能力和持久胜敌能力，从而也就能够从根本上坚定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必胜信心，使精神因素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更有力地发挥自觉的主观能动性去夺取胜利。

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还反映在武装力量的调整和加强上。过去我国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组成，现在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增加了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二炮兵原为我军的一个兵种，现成为一个军种，即我们的战略火箭部队。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取得很大成绩。这些因为在第一个问题中已经说了，这里不再赘述。这里要着重提到的是，我国民兵的组织和训练有新的改进，我国的兵役制度趋于健全。民兵是我国三结合武装力

量体制的组成部分，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重要力量。兵役制度也是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及实行人民战争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要制度。毛泽东同志一向重视民兵建设，曾提出过著名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原则。但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妄图把民兵从我国武装力量体制中分裂出去，搞所谓“第二武装”，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民兵建设。三中全会以来，从武装力量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实际需要出发，认真调整了民兵组织，减少了民兵的数量，缩小了组建民兵的范围，压缩了参加民兵的年龄，简化了民兵组织的层次，严格了民兵的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同时，改革了民兵的训练工作，减少了训练人数，精简了训练内容，改进了训练方法，妥善安排训练时间，着重搞好基干民兵训练。通过组织调整和训练改革，民兵队伍精干了，军政素质提高了，战备措施逐步落实，从而提高了民兵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关于兵役制度地发展，主要是实行了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我国一九五五年颁布兵役法后，也曾实行过军官和士兵的预备役制度。一九五八年大办民兵师，实质上废止了预备役制度，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一九八一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确定，把民兵和预备役结合起来，以适应国防现代化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要求。据此，所有应服兵役的公民，除一部分服现役外，其余经过登记，编入民兵组织服预备役，退出现役的官兵，只要符合条件，也一律编入民兵组织服预备役。基干民兵为一类预备役，普通民兵为二类预备役。实行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既坚持了我国传统的民兵制度，也恢复和健全了预备役制度，既有利于平时加强后备力量的建设，保持雄厚的预备兵员，更有利于战时快速动员，是实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做到寓

兵于民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关于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直实行志愿兵役制，这在没有全国政权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五十年代中期，适应我国新情况的第一部兵役法公布之后，便实行公民在一定年龄内都有义务服一定期限兵役的义务兵役制。实行义务兵役制，对于加强军队建设，积蓄后备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需要有一部分专业技术骨干长期在部队服现役。于是，一九七八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根据部队需要和本人自愿，将部分义务兵改为志愿兵，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这是我国兵役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对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有益的。

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反对霸权主义侵略的全面战争，要求有健全的、高效能的、有权威的战略领导和指挥。三中全会后，我国战略领导体制有很大发展。三中全会前，对于国家同武装力量的关系，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国防部相互之间的关系，缺乏明晰地规定。一九八二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中央军委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中央军委其他成员的人选，根据中央军委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定。在国家中央军委成立以后，党的中央军委仍然作为党中央的军事领导机关直接领导军队。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产生。党的中央军委和国家的

中央军委实际上是一个机构，组成人员和对军队的领导职能全完一致，只是在党内和在国家内同时有两个地位。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国务院设立国防部。国防部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在党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一切需要由政府负责的工作则由国务院作出相应的决定。这样的领导体制，正确处理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以及国防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能够更好地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而且便于运用国家机器，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便于我军在必要时，迅速转入战时领导体制，增强对突然事件作出有效反应的能力。这对保证国家安全，应付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都是有利的。

三、制定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

我军历次革命战争所实行的正确战略方针，都是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具体说主要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结合各次战争的具体实践制定的。因此，这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既有其共同点，又各有若干不同点。自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开始，直到粉碎“四人帮”前后，历史条件和战争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直没有制定出一个反映客观情况的确定的、明晰的战略方针，这对于战争准备、武装力量建设、教育训练、学术研究等各项工作地开展非常不利。粉碎“四人帮”后，特别三中全会以来，军委终于在一九八〇年制定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并明确了一系列战略指导原则。这一战略方针尽管有许多基本精神与历次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一致的，比如都强调后发制人，都强调充分的战争准备和持久的人民战争，都强调通过战略防御的积极作战行动，逐步改变战争形势，适

时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彻底歼灭敌人等。但是，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不管从其依据的客观情况说，还是从其思想内容说，都较前有了显著地变化和发展。就依据的客观情况说，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敌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国情更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党“四化”建设的政治路线，我们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都决定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只能是自卫的、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与这些客观情况相适应的战略方针的思想内容，也必然发生战略转变意义的变化和发展。这一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过程的，其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它不仅是我军的军事战略问题，从根本上说来是国家整个战略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基本精神，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在军事战略上有所体现。在国际关系复杂、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形势下，国家的一切建设事业不能不考虑积极防御的要求，军队在理解和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时，也必须从国家的战略全局着眼。这些特点是过去各时期的战略方针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所以，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尤其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认真坚持和发展。

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明确了战争初期的科学概念，强调了战争初期的战略地位。过去我们与技术装备较为落后的敌人作战，战争初期间题不很突出。后来的朝鲜战争，对手虽是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但我们可以是战争爆发四个月后参战的，也没有抗击敌人战略突袭的实践经验。因此，在以往的军事理论研究中，对战争初期

的重要战略地位强调不多，也没有明晰的战争初期概念。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军事学术研究地不断深入，逐步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为未来反侵略战争一开始，将首先碰到的严重问题，就是如何抗击敌人的战略突袭问题。为了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严重情况，军委对战争初期的科学概念作了阐明，“指出战争初期”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各个国家对它的理解和划分各不相同。我们的战争初期是从战争开始到完成战略掩护任务为止的一段时间，大体上是战略防御阶段的前期。我们在战争初期的主要战略任务是：抗拒敌人的战略突袭，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我军战略展开和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初步稳定战局。能否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战争初期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完成战争初期的战略任务，必须认真贯彻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原则：积极开展反空袭斗争，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坚持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制止敌人长驱直入；运用以阵地防御战为主的各种作战形式，积极打击敌人；建立并保持强大的预备队，确保防御的稳定性；慎重初战，避免同敌人进行战略性战役决战；密切协同，发挥整体威力。目前，全军范围内，在军队建设、战争准备、教育训练、学术研究等各方面，都把研究解决战争初期的问题作为最首要、最突出的任务。这是我军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明确粉碎强敌的进攻，不能靠“诱敌深入”这一着。我们在以往历次革命战争中，粉碎敌人的进攻，主要靠“诱敌深入”这一着。把它作为弱军胜强军的一个正确的军事政策，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甚至有时把它作为战略全局的指导方针。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情

况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我们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又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有了很大一批家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敌人进攻面前，我们一开始就把它放进来，就会使后方来不及做好充分准备，容易引起混乱，在政治上对我们也不利；而且霸权主义向我发动大规模进攻，必将采取突然袭击，长驱直入的手段，你不诱它，它也要进来。因此，我们在战争初期为了争取时间，制止敌人长驱直入，稳定战局，从战略上讲，不能搞“诱敌深入”。尽管现在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包含了“诱敌深入”的内容，但它不是指导全局的战略方针，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战略阶段，而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某些战略战役方向上，在一定时间内所适用的行动。这个思想是一个带有战略转变意义的重大发展。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战争初期将采取的主要作战形势是坚守防御的阵地战。我军过去作战，因为兵力弱小，装备极差，根据地既没有固定的战场建设和完善的后方基地，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城市和经济目标需要保护。因此，阵地战的地位比较低，当时在敌人进攻时，为了避强击弱，往往以运动战的形式与敌周旋。运动战在当时是我军歼灭敌人的主要作战形式。那时坚持的原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正确的。而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大不相同了，我们不仅有了实行阵地战的极大必要性，也有了现实可能性。在敌人进攻面前，我们绝不能再搞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城市、要点白白送给敌人，而是应该把它当作大量消耗和消灭敌人的战场。这就必须以坚守防御的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与敌人进行反复争夺，长期坚守。但在强敌猖狂进攻面前，仅靠阵地战还不足以制止敌人长驱直入，胜利完成战争初期的战略任务。